

智慧城市驱动基层治理创新研究

——以成都市智慧社区建设为例

潘慧迪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1日

摘要

数字治理赋能已成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在智慧城市纵深推进背景下, 数字技术重构治理结构、重塑主体关系、重塑服务供给逻辑, 为基层治理模式转型提供新的范式支撑。本文以成都市智慧社区为案例, 采用文献研究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案例研究方法, 基于数字治理、城市规划、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等理论框架, 系统剖析成都智慧社区的顶层架构、平台运行与场景落地逻辑, 梳理其治理成效与内在生成机理; 从技术锁定、制度壁垒、文化惯性与主体利益分化四维深度解构现实瓶颈, 并从制度建构、技术迭代、多元协同、人才赋能层面提出具象化、可操作的优化路径。研究旨在揭示智慧城市赋能基层治理的内在机理, 为国内同类超大城市推进智慧治理、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

智慧城市, 基层治理, 数字治理, 社区治理, 多元协同

Research on Smart City-Drive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Smar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Chengdu

Huidi P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April 24, 2026; accepted: July 9, 2026; published: July 21, 2026

Abstract

Digital governance empowerment has become the core path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文章引用: 潘慧迪. 智慧城市驱动基层治理创新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7): 149-156.

DOI: 10.12677/ass.2026.157557

governance in mega-cities. With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digital technology reconstructs governance structure, reshapes subject relations and service supply logic, providing a new paradigm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s. Taking smart communities in Chengdu as a case, this paper adopts a combined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policy text analysi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gital governance, urban plann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governance,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op-level structure, platform operation and scenario implementation logic of Chengdu's smart communities and sorts out its governance effects and internal formation mechanism. It deeply deconstructs practical bottleneck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lock-in, institutional barriers, cultural inertia and subject interest differenti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ncrete and operable optimization paths from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and talent empowerment. The research aim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smart city enabl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radigm for similar mega-cities in China to promote smart governance and improv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Smart Cities, Grassroots Governance, Digital Governance, Community Governance,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伴随数字技术迭代与治理现代化进程加速，智慧城市已从基础设施建设迈向治理结构重塑的深层阶段[1]。数字要素全面嵌入基层治理场域，改变传统行政运行逻辑、主体互动模式与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成为破解基层治理碎片化、响应滞后、协同不足等结构性困境的重要突破口。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结构复杂、治理场景多元，传统科层制治理模式难以适配精细化、动态化治理需求，亟需依托智慧城市建设实现治理范式跃迁[2]。既有研究多侧重技术应用描述或宏观政策解读，存在理论与案例脱节、现象描述有余而机理剖析不足、对策偏宏观泛化等问题，整体呈现“框架完整但内容空洞”的研究短板。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典型城市微观治理场景，以成都市智慧社区为实证案例，融入多学科理论视角，采用实地访谈与政策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智慧城市驱动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现实梗阻与优化路径，以期丰富数字治理的本土化理论阐释，同时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提供经验借鉴。

2. 文献综述

2.1. 研究背景

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建设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美国、新加坡等先发地区较早布局智慧化治理体系，形成技术赋能、平台统合、场景下沉的建设范式。国内自 2015 年“互联网+”战略落地以来，国家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逐步形成顶层设计引领、地方试点探索的发展格局。北京“接诉即办”、上海“一网统管”、杭州“城市大脑”等实践，标志着国内智慧治理从技术堆砌转向治理逻辑重构。成都市作为西部超大城市，以“智慧蓉城”为总体牵引，将智慧社区作为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关键载体，其建设路径与现实困境具备典型样本价值。从理论演进来看，智慧城市治理研究横跨公共管

理、城市规划、信息科学与社会学等多学科,数字治理理论逐渐成为解释基层治理转型的核心分析框架,为本文案例解剖与机理阐释提供坚实理论基础。

2.2. 核心概念界定

智慧城市是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运行数据进行感知、整合、分析与智能响应,实现城市管理精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发展可持续化的新型城市形态,强调技术赋能、人本导向与协同治理的统一,最终指向城市治理现代化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3]。本文将基层界定为街道(乡镇)及社区层面,基层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服务、社会秩序、矛盾化解、民生保障等事务开展的协商、协作与共治过程,是公共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与执行终端。基层治理创新是通过技术引入、理念更新、制度优化、主体重构、机制再造等方式,变革传统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率、公平性与回应性的系统性过程,包括工具创新、流程创新、结构创新与价值创新。基层数字治理创新是以数字技术为载体,以精细化治理为目标,推动基层治理数据贯通、流程精简、主体协同、服务下沉,实现治理模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判、从分散管理向整体协同转型的实践集合。敏捷治理强调治理过程的灵活性、适应性、快速响应与迭代优化,适用于场景复杂、技术迭代迅速的城市治理与基层治理场景。

2.3. 理论基础

数字治理理论是信息技术蓬勃发展背景下,将数字技术与治理理论深度融合形成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目前学界对数字技术的内涵已基本形成共识,即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以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型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治理工具,数字技术能够精准、高效地传递、整合与分析海量治理信息,在实际应用中呈现出交互性、全景性、可扩展性与智能性等特征,能够推动治理流程优化、效率提升与价值重塑[4]。英国学者帕特里克·敦利威(Palikk Duileay)在《数字时代的治理》中系统阐释了数字治理理论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趋势,提出数字治理包含重新整合、重塑整体、数字化过程三重核心要义[5]。

经过长期发展,当前学界对数字治理理论的核心主张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数字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统筹联动。在数字治理框架下,政府、社会、市场等主体能够借助数字技术打破信息壁垒,强化协作参与与资源共享。如王晨[6]指出,数字治理推动政府从资源与权力的主导者转向多元利益协调者,促使公众由零散式参与转向整体性治理参与,通过数字技术整合碎片化服务与职能,形成跨组织、跨部门的系统性治理生态。第二,数字治理理论主张推进管理体制变革。通过搭建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数字治理能够优化组织业务流程、打破数据孤岛、重塑组织结构,推动公共部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持续优化。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能够推动各级公共部门实现流程再造与体制优化,进而推动治理现代化进程[7]。第三,数字治理理论坚持以人民需求为价值导向。数字治理以回应公众需求为根本目标,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公共服务精准性与实效性,推动治理重心下沉,实现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在唤醒公共意识、创造公共价值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实现“智治”[8]。

2.4. 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已证实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具有显著赋能作用,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偏重技术应用分析,忽视制度、主体、文化等非技术因素的约束作用;二是宏观理论探讨较多,基于实地案例的机制剖析不足[9];三是对实践中的数据壁垒、重建设轻运营、参与不足等问题的深层成因挖掘不够。本文立足实践痛点,以成都市智慧社区为案例开展深度分析,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缺口,增强研究的现实解释力与应用价值[10]。

3. 研究设计

本文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政策文本分析法、半结构化访谈法与案例分析法，以多方法三角验证范式开展研究，保证研究严谨性与实证厚度。

3.1. 文献研究

在文献研究层面，系统梳理智慧城市、数字治理、基层治理创新、智慧社区治理等中外核心期刊、CSSCI 论文、学术专著与行业报告，厘清研究进展、学术共识与现存缺口，搭建本文理论分析框架，为案例剖析与机理阐释奠定学术基础。

3.2. 政策分析

在政策文本分析维度，本研究系统性地整理了 2018~2023 年期间国家、四川省、成都市及各主要城区发布的与智慧城市、基层治理以及智慧社区建设直接相关的官方政策文件，构建了纵向连贯、横向覆盖的政策文本语料库。在国家级层面，着重纳入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¹等具有顶层指导意义的文件；省级层面，包含了数字四川建设、城乡社区治理等系列专项规划；市级层面，对《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2018—2035 年）》²《成都市“十四五”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规划》³《成都市智慧社区建设导则及首批示范应用场景发布》⁴等核心枢纽型政策进行了全文梳理。上述政策文本在层级上覆盖了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执行落实的完整传导链条；在时间序列上跨越了成都市智慧社区从前期试点探索(2018~2020)到全面推进建设(2021~2023)的完整周期；在类型上兼顾了宏观规划类、实施方案类、技术标准类与管理考核类等多种政策工具类型，具有较为充分的分析覆盖面。通过对政策文本进行时序脉络梳理、主题分类编码以及深层内涵解构，本研究从制度层面系统把握了成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演进逻辑、阶段性制度安排以及顶层设计的结构性约束条件。

3.3. 实地调研与半结构化访谈

Table 1. Interviewees and coding framework

表 1. 访谈对象与编码体系

访谈对象类别	人数	编码规则	基本特征
街道分管领导及科室负责人	12 人	JD-01 至 JD-12	分管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智慧社区建设的副处级或科级干部
社区专职人员	45 人	SQ-01 至 SQ-45	含社区负责人/主任 15 人，专职委员 30 人
社区专职网格员	28 人	WG-01 至 WG-28	承担日常巡查、信息采集、事件上报的一线网格力量
物业服务企业及驻区商户代表	25 人	WY-01 至 WY-25	含物业项目经理、安保主管、社区商超与便民服务经营者
常住居民代表(含青年群体)	12 人	JM-01 至 JM-12	年龄分布于 25~45 岁，涵盖上班族、全职家长等
老年居民代表	10 人	JM-13 至 JM-22	年龄集中于 60~75 岁，含独居老人、随迁老人等

在实地调研与半结构化访谈环节，为保障样本具备理论代表性，本研究遵循理论抽样原则，选取成都市锦江区、武侯区、成华区、金牛区、双流区、郫都区等 6 个行政区内的 12 个典型智慧社区作为调研对象，涵盖老旧院落改造型、新建商品房智慧配套型、涉农集中安置型等不同类型社区，具体内容详见

¹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11/content_5624201.htm

²<https://www.planning.org.cn/2016anpc/view?id=780>

³<https://pmo42d14b-pic2.ysjianzhan.cn/upload/oi67.pdf>

⁴http://cds.sczfwf.gov.cn/art/2022/11/23/art_15395_198874.html

表 1。调研过程全程运用一对一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 累计访谈关键行动者 132 人, 具体构成如下: 街道分管领导及科室负责人 12 人(编码 JD-01 至 JD-12)、社区专职工作人员 45 人(编码 SQ-01 至 SQ-45)、专职网格员 28 人(编码 WG-01 至 WG-28)、物业服务企业及驻区商户代表 25 人(编码 WY-01 至 WY-25)、覆盖不同年龄段的常住及老年居民代表 22 人(编码 JM-01 至 JM-22)。访谈围绕智慧平台日常运行状况、条块数据共享难题、跨部门协同效率、居民参与意愿及障碍、运维资金与人才可持续性为核心议题展开。所有访谈均在知情同意原则下全程录音并转录为文字, 文中引用内容均作匿名化处理。通过对不同层级、不同角色行动者的访谈资料与政策文本、平台运行公开数据进行交叉比对与相互印证, 本研究致力于提炼成都智慧社区建设中的共性逻辑与差异化困境的双重图景, 以确保研究结论具有超越单一案例的外部解释力与理论普适性。

以下匿名摘录部分访谈对话, 以直观呈现智慧社区建设不同主体的真实体验与深层困境, 这些声音构成了本研究后续分析的质性证据基础。

摘录一: 某街道分管副主任反映, 当前市、区、条线系统多达七八个, 数据无法打通, 考核却要求每个系统保持活跃, 社区被迫反复录入, 根源在于部门间数据权限协调困难(访谈记录: JD-03)。

摘录二: 老年居民表示智慧小程序字小、层级多, 找不到所需功能, 办事仍习惯前往社区找工作人员面对面解决, 数字手段反而增加了使用障碍(访谈记录: JM-17)。

摘录三: 青年租户分享, 通过“天府市民云”在线预约办理居住证、随手拍报修楼道灯均获得快速响应, 切实提升了生活便利性, 期望未来接入更多实用功能(访谈记录: JM-05)。

4. 案例分析: 成都市智慧社区建设实践

4.1. 案例背景

成都作为常住人口超过 2100 万的超大城市, 其治理规模庞大、城乡圈层结构复杂、民生利益诉求高度异质, 传统粗放式治理模式已陷入严重的效能困境。在此背景下, 成都以“智慧蓉城”建设为总体战略引领, 明确将智慧社区定位为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关键战略支点。从城市规划理论视角审视, 成都对智慧社区的顶层设计并非无序的技术堆砌, 而是内在遵循了城市空间资源优化配置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布局的深层逻辑。通过在全域范围内统筹规划“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智慧治理节点的空间布局, 成都初步实现了数据采集前端、智能感知设备、便民服务终端等治理资源在不同圈层、不同类型社区间的合理分布与差异化配置。这一空间规划逻辑, 为后续数字化治理手段的有效下沉奠定了坚实的空间结构基础, 也从源头上规避了因空间规划无序而加剧“数字鸿沟”的结构性风险。

4.2. 实践样态

成都市秉持规划引领、标准先行的原则, 密集出台了涵盖总体规划、专项建设、应用导则等多层级的政策体系, 构建了“1-1-5-N”智慧社区总体技术架构。在数字底座建设层面, 着力打破区级、街道级分散建设的碎片化局面, 统筹搭建市级统一智慧社区综合信息平台, 整合门禁、安防监控、消防感知、环境监测等物联网终端数据, 初步实现了基层人、地、事、物、组织等基础数据的归集治理与实时更新。在应用场景开发层面, 围绕社区养老、公共安全、便民服务、协商自治等高频治理需求, 采用“统建通用+自选特色”模式开发了一系列轻量化、可复制的应用场景。运用数字治理理论进行深入剖析可以发现, 这一实践样态的深层逻辑与该理论的核心主张高度契合: 成都通过搭建统一平台强力整合以往条块分割的信息系统, 其实质是以技术刚性打破组织壁垒, 用数据流重塑业务流, 推动基层治理实现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的流程再造; 同时, 其场景化开发模式紧扣养老、安防等居民最迫切的需求, 深刻体现了数字治理理论所强调的以人民需求为价值导向的核心理念, 是技术赋能与人本导向在社区微观场域

的有机融合。

4.3. 治理成效

经过持续建设与迭代，成都智慧社区在运行机制、治理精度与多元参与维度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运行机制方面，通过平台驱动，纵向压缩了信息传递层级，初步明确了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的事件处置权责边界；在治理精度方面，依托对汇聚数据的集成研判，实现对社区高龄独居老人、特殊困难群体等高风险场景的主动预警与精准干预，推动治理模式从“接诉即办”的被动响应向“未诉先办”的主动治理转变。更为关键的是，从数字治理理论中多元主体统筹联动的视角来看，成都实践已初步呈现出对传统单一行政主导模式的超越态势：通过“天府市民云”等移动端入口及线下智慧议事厅，拓宽了居民意见表达与协商参与的常态化渠道；通过开放社区应用场景清单，开始吸引物业、商户、社会组织等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这一初现端倪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有力验证了数字技术在重塑主体间权力关系与互动模式、激发协同治理效能方面的理论逻辑，为同类城市的基层治理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5. 现实挑战：智慧社区建设的治理瓶颈

尽管成效初显，成都智慧社区建设仍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亟待超越表层现象的描述，将其置于“技术－制度－文化－利益”四维整合分析框架之中，开展对深层机理的探究。

第一，区域建设发展不均衡，其根源在于行政层级分割与局部利益区隔引发的统筹失效。从表象来看，各区县在智慧社区建设方面的重视程度和财政投入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区县缺乏与市级规划有效衔接的具体实施细则，致使社区平台与市、区级系统的接口标准缺乏一致性。然而，其深层机制在于超大城市内部“市－区”两级政府间存在行政分层治理和区域本位利益结构。由于缺乏由市级主导且具有刚性约束的统一建设标准、数据共享责任清单以及督查问责机制，各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依据自身财力和主观偏好进行“选择性执行”，将上级的“统筹规划”在实践中演变为“九龙治水”式的分散建设，导致政策衔接在纵向贯通环节出现断裂，数据流在区级节点被人为阻断。数字治理理论所倡导的“重新整合”，在此遭遇了体制性条块分割和局部利益最大化的顽强阻碍。

第二，数据壁垒现象显著，是技术锁定、制度僵局与部门文化三重逻辑深度交织并相互强化的结果。在技术层面，早期各社区智慧平台由不同技术开发商承建，采用不同的底层架构和私有通信协议，形成了严重的“技术锁定”效应，设备接口异构、数据格式不兼容，为后期互联互通带来了高昂的技术转换成本。在制度层面，传统官僚体制内部根深蒂固的“部门主义”思维和数据管控旧有惯例尚未打破，各部门普遍将独占的业务数据视为核心权力资源和隐性谈判筹码，跨部门共享的硬性制度约束和正向激励考核长期缺失，一份可跨域调用的“数据资源确权与责任豁免清单”亟待制定。在文化层面，上述制度僵局催生并固化了以“数据安全顾虑”为由的避险主义文化，即“不共享不出事，共享可能担责”的消极心态。部分单位更将“数据安全”作为合理化部门权力固守的修辞策略，将公共数据视为部门私有财产。技术壁垒、制度缺失与避险文化三者形成相互促进的封闭循环，共同导致了信息孤岛、基层重复采集、平台空转耗能等治理难题。

第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不足，本质上是主体间利益诉求分化、参与激励结构失衡和能力禀赋不均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就居民而言，尤其是中老年群体，面临明显的“数字素养差距”，智慧平台繁琐的操作流程和适老化设计的缺失，使其从使用意愿到应用能力均被排除在体系之外。就市场主体而言，由于社区智慧场景缺乏可持续的商业回报模式和有力的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其参与动力严重不足，投入往往沦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一次性象征性举措”。就社区组织而言，面临编制外专业技术人

才极度匮乏的困境，现有人员被大量数据填报等行政事务束缚，无力承担平台运维和场景创新。深入分析，这是由于顶层设计中未能构建一套能够有效识别和平衡政府公共利益导向、居民便捷需求、市场主体逐利本性三者间张力的激励相容制度安排，各主体基于成本 - 收益的理性计算，一致选择了“浅层参与”或“选择性不参与”，最终导致协同治理的集体失效。

第四，长效保障体系薄弱，核心原因在于“重前端建设、轻后端运营”的治理导向偏差和市场化运维机制的缺失。在资金方面，当前智慧社区前期硬件铺设和平台开发高度依赖一次性财政专项投入，而对后期系统迭代、设备维护、数据治理等持续性运营成本缺乏制度化预算安排。对于如何开放特许经营权、探索数据资产化运营等市场化反哺机制，实践探索严重滞后。在人才方面，基层社区岗位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对数字化专业人才缺乏吸引力，导致“引不进、留不住”，而针对存量社区工作者的系统性数字技能培训提升机制又流于形式。其背后的根源在于，治理导向仍将智慧社区视为一个可“交钥匙”的工程项目，而未能从治理范式转换的高度，将其理解为一个需持续“投资运营”的动态生态系统。缺乏与市场、社会力量合作进行长期价值共创的制度化接口，使得智慧社区极易陷入建设时避免陷入“轰轰烈烈开展，验收后便销声匿迹”的“公地悲剧”困境。

6. 优化策略：智慧城市驱动基层治理创新的实施路径

针对上述深层次瓶颈问题，需回归数字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整合、协同以及需求导向逻辑，把宏观方向性建议细化为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组合。

在制度供给与绩效考核维度，凭借刚性约束破除部门壁垒与区域分化现象。其一，由市级大数据主管部门牵头，尽快颁布《成都市智慧社区数据元标准与接口规范》，将其作为全市强制执行的地方标准，从根本上消除技术锁定与接口不兼容问题。其二，构建区(市)县“智慧社区建设成效”差异化考核指标体系，把“跨部门数据实时共享率”“平台功能实际活跃度”“居民数字服务满意度”三项核心指标，纳入对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年度绩效考核，并赋予不低于5%的权重，由市级定期通报排名情况。其三，健全市级 - 区级 - 街道 - 社区四级规划的强制性衔接审查机制，确保下级规划与实施方案不与市级标准相冲突，以制度的刚性保障全域统筹推进。

在技术底座与数据治理维度，借助统一中台与安全机制平衡数据共享与合规要求。其一，统筹建设“成都市智慧社区统一数据中台”，分批强制迁移整合各区、各部门现存的碎片化数据库，通过部署统一的API网关与数据交换协议，实现数据资源的无条件归集与有条件调用。其二，率先出台《成都市社区公共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操作细则》，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明确脱敏处理规则与隐私保护界限，引入区块链等技术实现数据流转全程可追溯，以此切实回应各部门的安全担忧，为数据能够共享、愿意共享扫除制度性障碍。

在多元协同与参与激励维度，以“社区合伙人”制度为核心破解参与冷漠难题。其一，由市委社治委联合市场监管、税务部门，正式推行“社区合伙人”制度。制定明确的项目补贴标准与税收减免清单，例如，对参与社区养老助餐、智慧停车、共享空间运营等微利便民场景的企业与商户，给予连续三年的经营场地租金减半或相应比例的税收抵扣。其二，实施“数字扫盲”专项行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专业社会组织面向社区中老年群体每年开展不少于4次的沉浸式、适老化数字素养公益培训，并将培训实效纳入服务验收考核。其三，搭建“线上议事厅 + 线下板凳会”相结合的常态化居民协商议事平台，将居民对智慧场景的采纳率与有效建议数量，列为社区治理考核的加分项。

在人才保障与长效运营维度，通过智力外援与内生培育双轮驱动破解人才困境。其一，组建由高校城市治理领域学者、领军信息技术企业架构师与一线优秀社区负责人共同组成的“成都市智慧社区治理专家智库”，为各区县提供常态化的规划论证、方案把关与技术诊断服务。其二，在社区专职工作者公

开招录岗位类别中,单列“数字治理”序列,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并配套建立技术岗位晋升阶梯。其三,建立社区数字治理志愿者时间银行激励机制,鼓励驻区高校信息技术专业学生、退休技术专家等组成志愿服务队,为社区提供常态化、轻量化的技术巡检与数字科普服务,构建富有韧性的社区数字人才生态。

7.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智慧城市作为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关键驱动力,可借助技术赋能、制度重塑以及主体重构等方式,切实推动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成都市智慧社区实践在顶层规划、平台运行以及场景落地等层面积累了成熟的经验。然而,受限于技术锁定、制度壁垒、文化惯性以及主体利益分化等因素,仍存在建设不均衡、数据孤立、协同性不足等深层次瓶颈。只有依托标准化的制度构建、统一的技术基础、多元的参与机制以及专业化的人才保障,才能够实现智慧社区从“建成”向“有效运行、长效发展”的转型。

7.2. 未来展望

未来可开展多城市比较研究,提炼不同类型城市智慧治理的差异化路径;可运用量化实证与追踪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治理效能进行量化评估;还可引入组织行为、政策网络等理论,进一步深化数字治理微观机理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张世贵, 吴合庆. 数字乡村建设何以推进共同富裕——基于“赋能-调适”的分析框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 40(2): 103-111.
- [2] 孟子龙, 任丙强. 地方政府数字治理何以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 S 市 A 区“一网统管”的案例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3(6): 15-22.
- [3] 余敏江. 整体智治: 块数据驱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J]. 行政论坛, 2020, 27(4): 76-82.
- [4] 金筱霖, 王晨曦, 张璐, 等. 数字赋能与韧性治理双视角下中国智慧社区治理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23, 41(1): 90-99.
- [5] Dunleavy, P. (2006) Digital Era Governance: IT Corporations, the State, and E-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王晨. 基于公共价值的城市数字治理: 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J]. 理论学刊, 2022(4): 161-169.
- [7] 辜胜阻, 王敏.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5): 74-80.
- [8] 郁建兴, 樊靓.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及其限度——以杭州城市大脑为分析对象[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2(1): 117-126.
- [9] 马亮. 数据驱动与以民为本的政府绩效管理——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的案例研究[J]. 新视野, 2021(2): 50-55+120.
- [10] 陈水生.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 动因、内涵与路径[J]. 理论与改革, 2022(1): 33-46+156.